

# 《诗经》中的“南土”诗歌与 毛传郑笺的文化指向

王德华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诗经》时代的中国、四方观念反映了周朝居天下之正中以统治四方的地缘政治思维, 这种思维也反映在《诗经》中。对《诗经》时代南土疆域的认知, 是将陈风视为南土诗歌代表的重要依据。毛郑对“二南”地域的阐释是《诗经》时代文王德化天下政治记忆的延续, 反映了北方文化的中心思想; 对《诗经》无楚风的解释以及对陈风作为南土诗歌代表的忽略, 反映了毛郑的南土观已经偏离了《诗经》时代对南土疆域的认知以及毛郑夷夏之别的地域政治思维。

[关键词] 中国; 四方; 南土; “二南”; 陈风; 楚风; 毛传郑笺

## A Study of Southern China Poems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Maozhuan and Zhengjian

Wang De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China and "Sifang (all sides)" during the age of *The Book of Songs* represent geo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Zhou Dynasty that China was located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This conceptualization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Book of Songs*.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Folk Songs of State Chen"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branch amongst the Southern China's folk songs can be proved by recognizing the territory of Southern China during the age of *The Book of Songs*. The interpretations concerning Zhounan and Shaonan in Maozhuan and Zhengjian inherited and extended the political memory of Emperor Wen of the Zhou Dynasty's moral governance, reflecting the thought which regards the Northern China as the cultural center. Maozhuan and Zhengjian's explanations of the "Folk Songs of State Chu" neglected in *The Book of Songs* as well as the ignorance of the "Folk Songs of State Chen", show that Maozhuan and Zhengjian's ideas deviated from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outhern China territory during the age of *The Book of Songs*. This also represents the geo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收稿日期] 2011-03-0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1-04-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188050-193235501\_9)

[作者简介] 王德华, 女,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研究。

uncivilized ethics .

**Key words:** China; Sifang; Southern China; *Zhounan* and *Shaonan*; the Folk Songs of State Chen; the Folk Songs of State Chu; Maozhuan and Zhengjian

关于《诗经》地理的研究,可以说从汉代四家说诗时就开始了并一直延续至今。其中对《诗经》中的“南土”及其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周南》和《召南》的考察上。对“二南”的地域研究关涉到“二南”的创作时间、创作主旨、“二南”之“南”的所指以及“二南”与楚风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从汉至今,举其要者,有以毛诗和后世尊毛派的文王德化南方说,以及反毛派的南音说、诗体说、楚风说等。可见,伴随着尊毛与反毛,其分歧的关键主要是在“二南”产生的时、地的看法上。如毛诗认为“二南”中的一些篇章产生于周文王时,是文王典治南土、德化南方的产物。而与反毛派的各种说法一致,反毛派或以“二南”产生于西周末年到春秋初期,或以“二南”全部产生于春秋时,其中部分或全部为南国的作品。更有论者认为“二南”就是楚风,如元代赵惠对“二南”产生时间虽从毛说,但又认为“二南”诗歌属于楚风。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陆侃如等人也提出“二南”实为楚风说,陆氏并认为“二南”晚出,全部是东周以后的作品,这样也就使春秋时期扩张后的楚国地域与“二南”地域相吻合,似乎弥补了《诗经》没有楚风的遗憾。而对《诗经》中无楚风的解释,郑玄从楚周关系,以夷夏之别论之,此论实源于班固《汉志》“孔子纯取周诗”说。顾炎武则以楚无诗释之。近现代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对以往观点的进一步论证与补充。如王泽强《〈诗经〉中楚国歌谣缺失的原因》一文,分别从“雅俗并兴的楚国音乐”、“楚周的对抗与冲突”及“《诗经》选诗的国家与周王室之关系”三个方面说明了《诗经》无楚诗的原因<sup>[1]</sup>。从中既可以看到顾氏楚无诗的文化偏见,又可看到郑玄观点的合理一面。

但是,以往学界对“二南”地域及与楚风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一种思维定势,即把楚国视为南土重要甚至唯一的代表,并忽略了对楚在《诗经》时代的地理位置及其政治中心变迁的历史梳理和地域考察,探讨的结果往往因时、地错位而不能令人信服。我们想追问的是跨时五百余年的《诗经》时代即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当时的南土概念为何?楚国在《诗经》时代的开疆拓宇有着怎样的历史进程?当时南土诸侯国,除了楚国,还有哪些重要的诸侯国?南方有无其他诸侯国诗歌入选《诗经>?笔者以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以现在的地域观念观照古代文学发生的地域,而应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梳理各个历史时期的地域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文学的地域分布及其成因。本文就试图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诗经》中“南土”所指及其诗歌表现,并对毛传郑笺的文化指向作一粗浅的探讨。

## 一、《诗经》时代的国家政治地理与南土疆域

《诗经》时代,“中国”、“四方”概念均已形成,《诗经》中涉及的“中国”以及与之相应的南土、北土、东土与西土概念,自然是《诗经》时代四方地域观念的反映。要弄清《诗经》中的南土地域,我们首先应对《诗经》时代即西周至春秋中叶国家政治地理有一大致的把握。

“四方”的概念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现,而“中国”一词,于省吾根据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及《尚书·梓材》指出:“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周)武王时期”,并认为“甲骨文之言四土和四方,均以大邑商为中心言之,西周时代才进一步以中土与四外方国对称”<sup>[2]1516-1517</sup>。据何尊铭文,武王灭商后就开始着意于对东都洛邑的营建。《逸周书·作雒》曰:“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

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sup>①</sup>武王卒后,周公继之,“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目的是使周朝国祚长久,从而使东都洛阳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汉书·地理志》言:“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sup>[3]1650</sup>将中土与四方联系起来,更加明确地说明了洛邑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以及“诸侯蕃屏四方”的政治意义。很明显,西周初年营建洛邑具有地域及政治文化的双重内涵,其中国、四方的天下观念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诗经》时代四方的四至及南土疆域,也有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尚书·牧誓》中可以看到,南土是周人继西土开拓后较先拓展的地理空间。《尚书·牧誓》中记载跟随武王伐纣有八国,即“庸、蜀、羌、鬲、微、卢、彭、濮”。伪孔传曰:“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叟,鬲、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此对八国只作了简单交代。孔颖达进一步指出八国皆为西南夷:“此八国并非华夏,故大判言之,‘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也。此八国皆西南夷也,文王国在于西,故西南夷先属焉……云‘羌在西蜀叟’者,汉世西南之夷,‘蜀’名为大,故传据‘蜀’而说。左思《蜀都赋》云:‘三蜀之豪,时来时往。’是蜀都分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别名,故《后汉书》‘兴平元年,马腾、刘范谋诛李傕,益州牧刘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鬲、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东偏,汉之巴郡所治江州县也。‘卢、彭在西北’者,在东蜀之西北也。文十八年《左传》称,庸与百濮伐楚,楚遂灭庸。是‘庸、濮在江、汉之南’。”<sup>②</sup>八国中地理位置较确切的是庸,在今湖北西北部竹山县一带,位于汉水上游之南。濮散居各地,故有“百濮”之称。随武王伐纣的濮应与庸接近,处于江、汉之南。因而八国地域大约北至今陕西省南部汉水上游的汉中、安康一带,西至今成都市,南至今贵州、湖南北部,东至今湖北西北部。

及武王克商后,随着政治中心的确立,四土四至的地域概念渐渐明晰。《左传》昭公九年载,詹桓伯对晋人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昭公九年为公元前533年,詹桓伯所言是春秋时人对武王克商后四土四至的追述,基本上反映了西周初年四土四至的情况。其中的南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言:“巴,疑即巴人之巴,或云今四川重庆市。濮,即文十六年《传》之百濮,今湖北石首县一带。楚,即楚都,今湖北江陵县。邓,今河南邓县”<sup>[4]1307-1308</sup>。关于楚在西周初年的地望,杨注不确。楚至春秋武王或文王时才从丹阳(今河南淅川)<sup>③</sup>迁都至郢(今湖北江陵)<sup>④</sup>。杨氏既把楚的地望定在湖北江陵,因而把濮定在湖北石首县,石首在江陵之南,两地相距不远。西周初年楚的地望在丹阳,那么随武王伐纣时的濮与武王克商后的濮应在同一地域,与楚接近。邓的地望有两说,即河南邓州与湖北襄阳,两地相去不远。徐少华引石泉说,认为西周以来邓国的地望当在“今襄樊市西北10余里的古邓城遗址”<sup>[5]12</sup>。襄阳位于汉水中游,与位于淅川的楚都地理位置更为接近。由此可见,詹桓伯提到的武王克商后的南土与武王伐纣时西南八国相比,其中心地域控制的南土范围稍向东推进,达到汉水中游一带。

《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郑桓公与史伯的对话,对以洛邑为中心的四土又有了新的说明: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

①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24-525页。按:“予畏周室不延”,《逸周书汇校集注》作“予畏周室克追”。汇校引王念孙按语云:“《初学记·居处部》引此本作‘予畏周室不延’,延误为追,后人因改为克追耳。”又引唐大沛云:“当作‘周室不延’。延是国祚长久之意,正与‘敬念于后’意相应,王(念孙)说是也。”今从之。

② 《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3页。按:顾颉刚通过考证认为,庸、卢、彭、濮与蜀“五国均在汉水流域,羌、微与鬲皆在渭水及河水流域。故如以秦岭与汉水为界,则此八国者,三在北而五在南”。虽然南方只有五国,但顾氏认为“武王伐纣而率此八国之师,自当为周人政治势力向东南扩展之结果”。参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牧誓八国》,(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 丹阳地望说法不一,今取河南淅川说,参见石泉主编《楚国历史文化辞典》,(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④ 楚迁都郢的时间有楚武王和楚文王二说,参见石泉主编《楚国历史文化辞典》,(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

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偏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邾、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sup>[6]460-462</sup>

《郑语》并言“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sup>[6]477</sup>，公元前781年周幽王即位，幽王八年当为公元前774年，桓公以叔父身份为王室司徒。《郑语》史伯并叹“凡周存亡，不三稔矣”<sup>[6]475</sup>，郑桓公与史伯的谈话当发生在幽王九年，即公元前773年。此次谈话涉及郑国东迁的重大决策，史伯为桓公分析西周末年的天下形势，提到以东都洛邑为中心的四土四至。其中提及的南土诸国为“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九国。徐元诰注曰：“荆蛮，即楚也。楚居蛮夷，国号荆。荆，强也。申、吕，今河南南阳县北二十里有申城，又县西三十里有吕城。应，《内传》云‘武之穆也’，是武王子所封。今河南鲁山县有应城。邓，今湖北襄阳县东北二十里有邓城。陈，国于宛丘，今河南淮阳县。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十里有蔡城。随，今湖北随县。唐，南唐也，刘累之封，今湖北随县西北八十五里有唐城镇。”<sup>[6]461</sup>以上提到的南方九国，鲁山县在淮河水系的沙河上游，荆楚未提及具体地域，其他八国分布在三大地域：申、吕在今河南南阳市一带，邓、随、唐在湖北北部汉水北岸一带，应、陈、上蔡在河南省中部、东南部淮北汝颖一带。关于楚在当时的活动中心，徐少华经过考证认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初年的楚国政治、经济中心也只能在丹江下游一带”<sup>[5]254</sup>。史伯所论西周末年南土地域，与西周初年相比，其重心进一步向东南推进，主要在湖北北部汉水流域、南阳盆地及淮北汝颖之间。

许倬云言：“在周初武王成王之时，周人经营的方向是东方及北方，而在中期，西周经营的方向是南方。南方又可分为偏东的淮上及偏西的汉上两个地区，而前哨据点都可远抵江干。”<sup>[7]184</sup>许先生所说的周朝中期始于周康王，据《竹书纪年》载，康王十六年南巡狩至九江庐山，周昭王十六年和十九年也都有过南伐之事。着眼于武王伐纣西南八夷从征，我们可以作这么一个补充：周文王、武王之世已开始经营南土，西南八夷及巴、濮、楚、邓即是其经营范围。随着西周中后期对南方的经营，南土向东南推进，延至淮北汝水、颍水之间了。

## 二、《诗经》中的“南土”及其诗歌

中国与四方的指称在《诗经》中也有多次提及。《诗经》中的“中国”一词出现在《大雅》的《民劳》、《荡》和《桑柔》三篇中，据毛序，皆为讽刺周厉王之诗，是西周末年诗歌。其中以《民劳》篇最为显著，诗中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毛序曰：“《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sup>①</sup>全诗五章，四次提到“中国”，一次提到“京师”。与“中国”和“京师”相应，一次提到“四方”，一次提到“四国”。京师乃东都洛邑，中国乃是以成周洛邑为中心的王畿之地。“中国”与“京师”都是“四方”与“四国”的中心，一广义，一狭义。四方与四国，应指周室统治力量所达的四方诸夏与夷狄戎蛮诸侯。作为西周公卿的召穆公，每以成周洛邑四方为言，意在继承武王、周公营建东都洛邑治国安民以应天命的精神，以此讽谏周厉王。《民劳》篇中的中国与四方概念正体现了西周时代的政治地理及其文化精神。笔者统计，四方一词在大小雅及《周颂》、《商颂》中，有27首诗歌使用，四国一词在曹风及大小雅中有10首诗歌使用，可见，中国与四方的概念已被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

与《诗经》中的四方、四国相应，《诗经》中出现了东土、南土与北土概念，集中在周公与宣王时

① 本文所引《诗经》及毛传郑笺，除特别说明外，皆出《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期,这与周公东征及宣王平定四夷的军事行动相应。宣王于厉王之后,面临着周室既衰、四夷交侵的政治局面,号称中兴的重要举措乃是南征北伐、平定四方。宣王经营四方,采取两手政策,一面征伐,一面防御。征伐方面,《小雅·六月》、《小雅·采芣》、《大雅·江汉》、《大雅·常武》四首诗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宣王经营四土疆域所采取的行动,是歌颂宣王南征北伐的代表诗作。防御方面,《大雅》中的《韩奕》、《烝民》及《崧高》就是分封诸侯并镇抚北国、东方及南土的代表诗作,反映了宣王任贤使能、赐命诸侯以化洽四方的政治地理背景。

而《诗经》的四方概念,南土涉及最多,其范围所指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从涉及南土的诗歌看,集中在宣王与平王时期。宣王对南土的态度也是南伐与防御并举,而平王重在防御。《小雅·采芣》及《大雅》中的《江汉》和《常武》主要反映了宣王对南方荆楚及东南淮夷和徐方的征讨。如《小雅·采芣》,毛序:“《采芣》,宣王南征也”。诗中云“蠢尔荆蛮,大邦为雠。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是宣王派方叔征讨楚国的诗。对东南淮夷及徐方的征讨主要反映在《大雅》的《江汉》和《常武》两首诗中。《江汉》诗云:“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此由江汉水路进击淮夷。《常武》诗云“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诗中多次提到徐方、徐土和徐国。就诗的内容看,《江汉》为征伐淮南之夷,《常武》为伐淮北夷及徐方。王礼卿《四家诗旨会归》曰:“陈氏鹏飞云:‘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扬州在淮南。《江汉》、《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江汉之浒,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则江汉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则徐土非连接之地矣。按征淮南之夷,不言淮浦,征淮北不言江汉,可知其地隔远。徐夷之联结叛国,而不忧淮北诸夷为淮南之援也。《常武》自在《江汉》之后,《竹书》以为一时并举,非也。’此据诗之地理,以推进兵之形势,而明两诗为淮南夷淮北夷之分,征伐先后之别,亦证确理当。”<sup>[8]1774</sup>由《江汉》、《常武》我们可以看到,西周后期的南土地域已向东南推进,到达淮河中下游流域。

《大雅·崧高》则反映了宣王时对南土的防御。毛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诗中所言“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毛传曰:“谢,周之南国也。”朱熹《诗集传》:“谢,在今邓州南阳县,周之南土也。”<sup>[9]248</sup>谢应是申南迁谢之前南国一诸侯国。周宣王为了加强对南土的控制,迁申于谢,所谓“维申及甫,维周之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申伯是周厉王妻申后之弟,宣王的母舅。宣王利用申与周室的姻亲关系,加强南土防卫,所谓“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中国在宣王至东周平王时确实发挥着巨大作用。平王东迁后,还派兵戍守,如《王风·扬之水》,毛序言:“《扬之水》,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据诗序,此诗作于平王东迁后。诗中提到的申、甫(吕)及许三国,申在今河南南阳市,吕在今河南南阳市西,与申邻近,许在今河南许昌市。王礼卿《四家诗旨会归》曰:“《嵩高》传,以申为四岳之后。《郑语》韦注曰:‘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咎之舅也。太子将奔申,幽王伐申。申缙召西戎以伐周,杀幽王于骊山之下。’是申为平王母家,所以戍之之故也。陈氏免云‘甫即吕国。《诗》及《孝经》、《礼记》皆作甫,《尚书》、《左传》、《国语》皆作吕,甫吕古同声。甫四岳之后,申同姓。《郑语》:史伯曰:‘当成周者,南有申吕。又曰:‘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案吕称强国,且共隩爱太子,则平王东迁,吕有力焉。’是所以戍甫之故也。又云‘……《左传》疏刘炫引《汲冢纪年》:‘平王奔申,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据此,许有立平王之大功。’是所以戍许之故也。”<sup>[8]589</sup>可见,平王派兵戍三国,一是三国为南方姜姓诸侯,是防范南土楚国的重要蕃国;二是此三国在平王东迁中都起到过作用。

综上所述,《诗经》中涉及的南土是以申、邓、吕及楚为中心的南阳盆地及江汉流域一带,随着周王室东部的拓展与稳定,渐拓展至淮河流域,其表现出的中国、四方地域观念与《诗经》时代国家政治地理结构及演变基本一致。

就以上对西周春秋政治地理及《诗经》南土地域的考察可知,十五国风的地域分布以东都洛邑

为中心,呈东、西、南、北四方分布格局。陆侃如认为:“我们研究十一《国风》,知道他们是环绕着东都的。邠、秦在其西,魏、唐在其北,卫、齐在其东,郑、陈、桧、曹在其南。”<sup>[10]126</sup>按:文中说郑、陈、桧、曹在其南,核诸《诗经》时代的南土概念和疆域,只有陈在其南,曹、桧与郑均在其东。西方有豳风、秦风;北方有卫风、邶风、鄘风、魏风、唐风;东方有齐风、曹风、桧风、郑风;南方只有陈风。唯“二南”诗歌地跨南北,其中部分诗歌属南土诗歌。《周南》中的《汉广》、《汝坟》言及汉水与汝水,两诗应产生于江汉流域及汝水流域。《召南》中有《江有汜》一首,中言“江有沔”,《说文》:“沔,江别流也。出岷山,东别为沔”<sup>[11]517</sup>。李樛曰:“《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沔。梁州之域也。江、沔之间即梁州之界,乃岐西之地。居江、沔者,以江沔起兴。”<sup>①</sup>可见此诗所言是在长江上游蜀地一带。以上三首明显属于南土诗歌。

### 三、《周南》、《召南》与毛传郑笺的文化指向

学界对“二南”之“南”的释义有南音说、南国说及诗体说等分歧,对周、召解释大都与周公和召公二人联系起来。“南”字单独解释都与南土相关,而将“南”字与周召二公联系起来,势必带来南北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的问题。如《吕氏春秋·音初篇》:“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行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sup>[12]334-335</sup>又如崔述《读风偶识》中提出南为诗体说:“且南者乃诗之一体”,“盖其体本起于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sup>[13]530</sup>。以上两说说明了“二南”乐曲、诗歌风格均源自南方,“二南”诗歌存在一个“周召取风”、“北人效之”的南北融合特征,与毛传郑笺的文王南化说相较,有着文化主体归属的根本不同。郑玄《周南召南谱》在毛诗序的基础上对“二南”进行释义。郑氏首先回顾了周发展史,用《禹贡》九州观念解释周迁徙岐山之阳的历史,也是周、召二公所封之采邑。其次,郑氏对“二南”的地域进行了解释。商纣时,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文王之化被于“雍、梁、荆、豫、徐、扬”六州。而“二南”中的南即指“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再次,解释“二南”诗歌辑录的时间,即武王伐纣后,为了观民风俗,“二南”即作为“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被收录。周南与召南的区别就是得圣人之化者与得贤人之化者。可以看到,郑谱在毛序的基础上,结合周族迁徙的历史与《禹贡》九州观念,解释了“周”、“召”、“南”的地域,并以文王之化释“周南”、“召南”。很显然,郑玄认为“周南”、“召南”是指周文王典治南土这一特定时间内带有地域与文化的双重含义的概念。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周文王的德政及德化南土是毛郑解“二南”的重要政治文化基础。因此,“二南”25篇作品中,郑谱将《召南》中的《甘棠》与《何彼襛矣》二诗定于武王时,其余23篇作品都定于文王时代。而文王德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非常重视人伦教育,尤其是夫妇男女之道。《周南》共11篇,明颂后妃的有9篇,即《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置》、《采芣》、《麟之趾》。余下两篇即《汉广》和《汝坟》,从毛序郑笺看来,都是文王化及南国的产物。《召南》共14篇,多为颂夫人之德,其中有5篇毛序涉及文王之德、召伯之教被于南国者,即《甘棠》、《羔羊》、《殷其雷》、《摽有梅》及《江有汜》,但只有《江有汜》一首有着明显的地域指向。

若以诗文相证,“二南”中唯有《汉广》、《汝坟》及《江有汜》三首明确为南土诗歌。毛传郑笺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以《关雎》、《鹊巢》为代表的诗作颂后妃之德、歌夫人之贤,充分体现了文王时代“风天下而正夫妇”的德教方针,南国三首代表诗作则是文王之化被于南国的体现。尤其是《汉广》,如果我们将其与《关雎》相较,毛传郑笺的文化指向则更加明确。《关雎》中的“淑女”作为后妃求之

① 转引自张保见《诗地理考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的对象,反映了思贤之德。而《汉广》中的“游女”则成为男性“不可求”的对象,反映出男子“思无犯礼”的道德自律,是文王之化的具体体现。

文王德化天下,除了《诗经》中《周颂》及《大雅》有诗颂扬外,也多见于先秦其他典籍。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前542)曰:“《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则而象之也。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sup>[4]1194-1195</sup>文王德化天下,不仅使大国畏之、小国德之,而且成为治理天下的美谈和效法的楷模。孔子更以量化表现,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sup>[14]34</sup>。郑玄根据九州说将“三分天下有其二”释为雍、荆、梁、豫、徐、扬六州。后人因之,在相关的问题上也多引九州以释之。此六州,核诸当时的地理,除周发祥本土在雍州外,其余五州包括从西南至东南的大片地域,极言文王德化广被。再就先秦典籍中人们对“二南”的评价,也可看出“二南”的地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季札于鲁观乐:“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杜预注曰:“《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犹有商纣,未尽善也,未能安乐,然其音不怨怒。”<sup>[15]2006</sup>孔子用“二南”教育子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sup>[14]185</sup>孔子强调“二南”具有的人伦教化作用,并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sup>[14]30</sup>,具有中和之美。毛郑将“二南”定在周文王与武王之时,其南化说延续了西周春秋以来的文化与政治记忆。因《诗经》是周王室制礼作乐的政教产物,毛传郑笺之说反映了北方中心霸权的文化指向。也就是说,“二南”之南即使如《吕氏春秋》及后人考证的为南音、诗体或南国等诸说,但经过周人的接受与改造,其文化重心已从南转向北,即如毛序所言“南,言化自北而南也”,“二南”中的一些南方诗歌,其地域是南方的,但其精神与文化却是北方的,是文王化育的结果。

#### 四、毛传郑笺的南土观与楚风、陈风

从毛郑对“二南”的解释,可以看出毛郑对南土地域的认知是“江汉汝旁”南国之诸侯。毛郑认为“二南”中有南国之诗,但由于把“二南”诗基本定于文王时,而西周武王、成王时才大封诸侯,故很难指出“二南”中的具体国名,体现了毛郑解诗的慎重,也致使后人对“二南”是否为楚风进行探讨。但“二南”即是楚风说,缺乏对楚国开疆拓宇的历史进程以及楚周关系等问题的具体思考,因而呈现出时地错位的研究状况。如元代赵惠解释国风无楚诗云:“孰知楚之封域,正在江汉汝沱之间,以《汉广》、《汝坟》、《江有沱》数诗观之,其民被文王之化,得于耳濡目染者有素,而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则其诗,亦楚之诗也,然圣人归之周公、召公,其意深矣。”<sup>[16]2</sup>赵氏既遵从郑氏之说,认为“二南”为文王南化的结果,又不能细考西周初年楚国的地域仅在丹江下游一带,土不过同,而以楚强盛时的疆域视之,并认为“二南”中的一些诗为楚风,其失明显。胡适认为“二南”中涉及的“汉水、江水、汝水”就是后来楚的疆域,并以此断定“二南”中大半是楚风,与赵惠犯的错误是一样的<sup>[17]261-262</sup>。陆侃如也认为“二南”即楚风,并把“二南”作时往后推移至春秋,以求得时地的一致。但进入春秋之后的楚国,因其日渐强大,楚周对抗日显。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周王室还采录楚风置于《诗经》之首,并获得季札、孔子等人的欣赏与赞许,这种情况则是持楚风说者没有解答的关键问题。

如果说郑玄无法具体指出正风“二南”中南土诗歌所系为何国,那么郑玄对“南国诸侯政之兴衰,何以无变风”疑问的回答,则较为明显地体现了毛郑的南土观。郑氏《周南召南谱》:

问者曰:“《周南》、《召南》之诗,为风之正经,则然矣。自此之后,南国诸侯政之兴衰,何以无变风?”答曰:“陈诸国之诗者,将以知其缺失,省方设教为黜陟。时徐及吴、楚僭号称王,不承天子之风,今弃其诗,夷狄之也。其余江、黄、六、蓼之属,既驱陷于彼俗,又亦小国,犹邾、滕、

纪、莒之等，夷其诗，蔑而不得列于此。”<sup>[18]26</sup>

郑氏首先认为周室采诸侯之诗的目的是了解诸国政治缺失，省察四方诸侯，根据施行教化的好坏作为黜陟的依据。南方徐、吴、楚僭号称王，不听周天子风教，其他小国又望风跟随，为正夷夏之别，故被黜除在采诗之列。就楚国而言，由于楚对分封不公的不满，楚与周的关系大都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进入春秋，由于周室的衰微，楚对抗王室之心愈显。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4），武王在请王室尊楚称号而王室不听的情况下，自尊称王，是郑氏所谓“不承天子之风”的突出表现。武王之后，经过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励精图治，至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时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对这样一个以蛮夷自称又自尊为王而崛起南方的大国，楚风不入《诗经》，郑玄夷夏之别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顾炎武《日知录》卷三《楚吴诸国无诗》云：“吴、楚之无诗，以其僭王而删之与？非也，大师之本无也。楚之先熊绎，‘辟在荆山，筦路蓝缕，以处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其御王事’，而楚无分器。岐阳之盟，‘楚为荆蛮，置茅莛，设望表，与鲜牟守燎，而不与盟’。是亦无诗之可采矣。况于吴自寿梦以前，未通中国者乎？”<sup>[19]128</sup> 顾氏之说是无法成立的，顾氏所说楚的地域与卑弱是西周初年周成王之时，而郑氏所言是春秋以后壮大起来的楚国之事。从历史地理角度论之，顾氏与上文赵惠相似，犯了时地错位的错误。而顾氏“无诗可采”之说也带有楚文化低于北方文化的文化偏见。但在郑氏眼中南土只有楚、徐、吴几个大国以及江、黄、六、蓼等几个小国，其南土观也已偏离了《诗经》时代的看法，代之以夷夏之别的地域政治色彩，因而未能依《诗经》时代人们对南土地域的认知把陈风视为南土变风的代表。陈作为虞舜之后在周武王克殷后续封，其地望及陈与周王室的关系可参《汉书·地理志》所言：“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sup>[3]1653</sup>。与周王室的姻亲关系或是陈为南土之国人选《诗经》的原因之一。

再从楚国崛起南土的历史进程看，进入春秋后，楚国虽不断蚕食南土姬姓与异姓诸国，但至春秋中叶，南方重要的诸侯国陈国、蔡国还存在。就毛序与郑谱，陈风创作于陈幽公（前854—前832年在位）至陈灵公（前613—前599年在位）时，即西周末期至春秋中叶，为变风刺时之作。陈灵公君臣淫乱，时楚正在楚庄王的带领下走向问鼎中原之路。楚庄王于鲁宣公十一年（前598）伐陈，灭之为县，后虽复陈，但陈从此一蹶不振，于鲁哀公十七年（前478）被楚所灭前，基本上附属于楚。清代高士奇说：“春秋灭国之最多者，莫楚若矣……南梃荆蛮，而北为中原之蔽者，最大陈、蔡……陈、蔡不支，而楚兵且交于上国矣。”<sup>[20]660</sup> 可见陈在南方诸国中的重要作用。陈的衰败也意味着春秋中叶楚国在南土的进一步拓展，但这也正是《诗经》时代结束的时候。

关于陈在春秋中期以前及以后的地域变化可参徐少华所言：“春秋中期以前，陈国疆土东至今安徽亳县、涡阳一带，南达颍水与顿、项、养、胡等国为邻，西至今西华县以西与许国相望，北约在扶沟、太康一线与郑、宋相交。春秋中期以后，陈国领土渐为列强蚕食，日渐缩小，最终为楚所兼并，成为楚国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sup>[5]195</sup> 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吴起拔郢，楚迁都于陈，至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去陈迁都寿春，陈作为楚国后期的都城达37年<sup>①</sup>。可见，陈国与楚国在地域和文化上的关系十分密切。陈国不仅在地域上与楚邻近，成为《诗经》中南土诗歌的代表，其诗的重要特色之一——歌舞祭祀的巫风背景也与楚有文化上的关联。陈风在十三变风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巫舞祀神的民风。《汉书·地理志》：“妇人（元女大姬）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坎

① 《史记·六国年表》：考烈王十年（前253），“徙于巨阳”。近人多以为楚都此时自陈迁至巨阳，在今安徽阜阳县北的汉细阳县治。也有学者指出：巨阳的定位缺乏确证；史书多称楚都于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自陈迁至寿春，《六国年表》所记也许应作其他解释，而不是指楚都的迁徙。参见石泉主编《楚国历史文化辞典》，（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另参徐少华《楚都钜阳及其相关问题考辨》，载《九州》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0—186页。

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吴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其能久乎!’<sup>[3]1653</sup>郑氏《陈谱》综合毛传与《汉志》,一方面尊奉毛传将陈风看做幽公以下的陈国变风,另一方面又溯其源,将变风的原因与元女大姬好巫覡联系起来,叙述陈的历史、地域、风俗及陈风作时的缘由,也涉及大姬好巫则民从之的习俗对陈风的影响。楚在春秋战国时也以巫舞祀神著称,对屈原改作《九歌》,王逸《九歌序》有过解释。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sup>[21]55</sup>此正可以看到屈原改作《九歌》的巫风歌舞娱神的民俗以及陈楚民风相近的特征。虽然《诗经》无楚风,但陈风也足以让我们了解到《诗经》时代南土疆域歌诗的重要特征。

综上,《诗经》时代的中国、四方概念有着特定的时代特征,其南方、南土或南国的认知与我们现在的南方体认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只有把《诗经》置入《诗经》时代的地域空间结构中才能较为合理地区分《诗经》诗歌的地域分布。毛传郑笺的文王德化南国的文化中心思想,使“二南”的解读延续了西周时代人们对文王以德经营天下的政治记忆,也反映了南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郑氏对南国何以无变风的解释,说明了诗无楚风的原因,显示了郑氏受到夷夏之别的正统观念左右,其南土观已偏离了《诗经》时代对南土的地域认知,也是郑氏未把陈风视为南土诗歌代表的重要原因。

#### [参 考 文 献]

- [1] 王泽强:《〈诗经〉中楚国歌谣缺失的原因》,《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第112-114页。[Wang Zeqiang, Why is Chu Songs Excluded in *The Book of Songs?* *Literary Heritage*, No. 4(2007), pp. 112-114.]
- [2] 于省吾:《释中国》,见胡晓明、傅杰主编《释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15-1524页。[Yu Xingwu, "Expositions on China," in Hu Xiaoming & Fu Jie (eds.), *Expositions on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8, pp. 1515-1524.]
- [3] 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Ban Gu, *A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Vol. 28 (I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
- [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Yang Bojun, *Annotations on the Chunqiu Zuoz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
- [5]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Xu Shaohua, *Geography and Culture of Zhou Dynasty's Southern China*,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6] 徐元浩:《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Xu Yuangao, *Annotations on Guoy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 [7] 许倬云:《西周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Xu Zhuoyun, *A History on Western Zhou Dynast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 [8] 王礼卿:《四家诗指会归》,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Wang Liqing, *A Collection of the Main Viewpoints of Sijiash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
- [9] 朱熹:《诗集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Zhu Xi, *Shi Jizhuan*,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2007.]
- [10] 陆侃如:《〈二南〉研究》,见《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6-136页。[Lu Kanru, "Research on Ernan," in *Collected of Lu Kanru's Classical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7, pp. 126-136.]
- [1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Duan Yucai, *Annotations on Shuowen Jiez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1.]
- [12]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Chen Qiyou, *Corrections and Annotations on Lüshi Chunqiu*, Shanghai: Xuelin Press, 1984.]

- [13] 崔述:《读风偶识》,见《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Cui Shu, *Dufeng Oushi*, in *Posthumous Papers of Cui Shu*,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3.]
- [14]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Yang Bojun, *Interpretations and Annotations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15]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见《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Kong Yingda, *Chunqiu Zuozhuan Zhengyi*, in *An Orthodox Exposition of the Thirteen Confucian Classic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16] 赵惠:《诗辨说》,见《丛书集成初编》第1727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Zhao De,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Book of Songs*, in *Congshu Jicheng Chubian: Vol. 1727*,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7.]
- [17] 胡适:《谈谈〈诗经〉》,见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八,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261-273页。[Hu Shi, "Study on *The Book of Songs*," in Hu Ming (ed.), *Selected Works of Hu Shi: Vol. 8*, Beijing: Guangming Daily Press, 1998, pp. 261-273.]
- [18] 冯浩菲:《郑氏诗谱订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Feng Haofei, *Correc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Zheng's Poetry Chronicle*,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19] 陈垣:《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Chen Yuan, *Corrections and Annotations on Rizhilu*,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0] 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卷四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Gao Shiqi, *Zuozhuan Jishi Benmo: Vol. 45*,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 [21] 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Bai Huawen, Xu Denan & Li Ruluan, et al., *Re-annotation of Chu Song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邮发代号: 国内 32-35 国外 BM 372

### 欢迎订阅 2011 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由教育部主管、浙江大学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是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入选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华东地区优秀期刊、浙江期刊方阵“精优型”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历年来源期刊,并被国际重要检索机构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及波兰《哥白尼索引》(IC)等收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全国最早采用“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的学术期刊之一(1998),目前为双月刊(200页),大16开本,逢单月10日出版,全年共6期,定价38元/期,228元/年。

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编: 310028

网址: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电子邮箱: [zdxw@zju.edu.cn](mailto:zdxw@zju.edu.cn)

电话: 0571-88273210、88925616

传真: 0571-88273210